

视 点

亚洲秩序构建与中国角色： 以权力分享为框架

王俊生

【内容提要】亚洲秩序建立之初就呈现“碎片化”特点，近年来亚洲制度格局与权力格局张力增大，美国进一步破坏了秩序的积极因素，地区主要行为体也在努力推动秩序变革，亚洲秩序正处于深刻调整中。秩序调整的主要表现在于，中美对峙与亚洲分裂加剧，美国推动秩序构建的合法性下降，地区相关热点问题固化。基于中美两国实力格局和两国利益与意愿，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考虑，在亚洲地区应建立权力分享型秩序。中国推动亚洲秩序构建的目标在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有利地缘环境。为此，应妥善处理好美国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平衡，既能对冲和反制美国同盟体系的负外部性因素，又能发挥美国积极因素维护地区稳定。处理好以下平衡：中国特色与地区普适性的平衡，避免“中国中心论”和“地缘政治论”，加强区域合作；历史与时代的平衡，采取和平主义方式推动秩序变革；中国传统文化与实力的结构平衡，处理好国内问题。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22)03-0120-0015

【关键词】亚洲秩序 中国角色 “一带一路”

权力分享型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全球战略”（项目批准号：2020QQYB05）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视角

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构建是国际关系讨论的主要议题，更是崛起国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崛起国的目标是使用一套自己的理念改造或新建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最终构筑起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秩序。”^①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秩序中的中国角色高度关注。王鸿刚研究员指出，“中国完全有条件发挥类似18—19世纪欧洲诸国及20世纪的美国在现代国际秩序演进中曾发挥的作用，成为21世纪推动国际秩序新一轮现代化的中坚力量”^②。2021年3月，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在《外交政策》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认为“世界期待中国的基于规则的秩序”^③。同时，面对美国在政策层面的有关歪曲行为，中国也需要正面回应。2015年11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卡特指出，中国“正在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釜底抽薪”^④。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美国的印太战略》等文件中大肆攻击称中国正在挑战国际秩序^⑤。

中国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的想法，更谈不上有构建全球秩序的设计，“中美战略竞争还远未走到国际秩序领导地位争夺的历史阶段”^⑥。中国实力所及与利益所在主要在周边地区，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推动建立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亚洲文明对话等主要对象是亚洲地区，亚洲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的发展走向感知也最为敏感，中国如果不能成功在亚洲地区推动秩序构建，就很难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中国不能引领亚洲秩序转变，那么讨论中国如何改变国际秩序就没有意义。”^⑦

围绕中国与国际秩序构建，国内已有一些高质量研究成果。徐进详细分析了中国构建国际秩序的必要性，并特别强调理念的意义，“崛起国崛起进程终极目标并非物质性实力的赶超，而是要构建一个自己能够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国际秩

① 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4期。

② 王鸿刚：《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与中国的时代责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2期。

③ Stephen M. Walt. China Wants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oo.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china-wants-a-rules-based-international-order-too/>

④ Russia is putting world peace at risk, says Pentagon chief Ash Carter. CBS News, November 8,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5/nov/08/russia-is-putting-world-peace-at-risk-says-pentagon-chief-ash-carter?CMP=gu_com

⑤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⑥ 朱锋：《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

⑦ 贺凯、冯惠云：《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一种类型化分析》，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

序两个关键性要素国际制度安排和国际主流价值观均与理念有关。因此,未来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很可能演变为‘权力+理念’的复合竞争”^①。与之类似,贺凯等将国际秩序分为三个层次:权力、规范(比如主权原则等)、规则(比如联合国等组织与机制)^②。刘丰在研究中加入了“利益”的概念,将国际秩序定义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在特定实力对比基础上围绕彼此的利益分配达成或明确或暗含的共识,并由此形成一套约束和规范各自行为及彼此关系的安排(包括习惯、规则和制度)^③。周方银在研究中更强调秩序的特点,“地区秩序是在地区特定的权力分配结构之上形成的一种稳定地区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一定可预测性的国家之间稳定行为模式”^④。

上述研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均认为秩序构建应从权力与理念两方面入手,为中国推动亚洲秩序构建提供了方向。

有关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即理念或目标,有学者认为是“一带一路”,也有学者认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实践看,“一带一路”倡议更多是行动方案或者合作平台,不是理念,也不是权力。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念的话,它和权力以及“一带一路”的关系都需要深入研究。还有学者认为,亚洲未来秩序模式将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美共治模式、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规范模式,以及地区各国复合依赖模式的混合体^⑤。我们认为,亚洲秩序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会包含上述因素,问题在于以什么为主,构建主体与方式是什么。有鉴于此,本文接下来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亚洲地区秩序的走向以及中国应如何实现秩序构建。

二、深刻变革调整中的亚洲秩序

(一) 亚洲秩序深刻变化调整的表现

2017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而“大变局”本身也意味着国际与地区秩序变化,其中,亚洲秩序深刻变化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 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

② 贺凯、冯惠云:《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一种类型化分析》。

③ 刘丰:《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④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

⑤ David Shambaugh. *Asia in Transition: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 2006. Vol. 105, no. 690.

第一，在地区热点问题解决和地区稳定维护上的中美合作越来越转向对峙模式。以朝鲜半岛问题为例，此前在多轮六方会谈期间以及特朗普政府之初通过的多项有关决议均是中美合作的成果，但近年来围绕朝鲜发射导弹的原因以及应对手段等，中美发生严重对峙。其背后根源在于，有关亚洲秩序构建，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无论是出发点还是手段与特征均截然不同，美国越来越将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在内的亚洲相关问题作为对华战略打压的筹码。

第二，美国主导的涉及亚洲地区的一系列多边机制不仅遭到中国反对，也引起其他国家不满，美国推动秩序构建的合法性下降。比如针对奥库斯联盟(AUKUS)，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明确表示忧虑，担心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对于“印太战略”，新加坡、柬埔寨、菲律宾、老挝、文莱和缅甸等国也沉默应对^①。主要原因在于，东盟国家担心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会影响到地区规则制定的东盟中心地位，影响该地区开放的多边主义与法治传统。

第三，在相关热点问题上，有关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极限施压方式，比如朝鲜半岛问题在2017年几乎战争一触即发，2022年3月24日朝鲜高调试射洲际导弹火星-17，这也是自2017年以来朝鲜首次试射洲际导弹，高调施压美国。2020年6月，中印在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双方均有多名士兵伤亡。这表现出相关国家对当前秩序的强烈不满，希望通过超强度施压打破现状。

第四，美国与其盟友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张力越来越明显。韩国文在寅政府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越来越想走自己的路，并积极推动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日本积极推动修改宪法力图突破二战后对其的约束，想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

(二) 亚洲秩序深刻变化调整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建立了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规范与国际机制，这种秩序也常被称为“联合国秩序”^②。在经济体系中建立了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6年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亚洲秩序形成之初就呈现“碎片化”特点，蕴含着秩序变化调整的内在动力。

第一，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的51个创始会员中，亚洲地区仅有7个，即中国、印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黎巴嫩和菲律宾。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

^① 刘若楠：《中美战略竞争与东南亚地区秩序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

^② 姚遥：《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5期。

23个创始会员中，亚洲地区仅有4个，即中国、印度、缅甸和斯里兰卡。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被剥夺联合国会员身份。由此可见，亚洲多数国家是被动参与联合国秩序的。

第二，亚洲制度格局与权力格局多元化，内在张力较大。在制度格局上，亚洲地区既有采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有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有采取君主制的国家。在权力格局上，亚洲地区呈现出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中国、俄罗斯和东盟“四足鼎立”的状况。印度也是亚洲地区的重要力量。制度格局多元化和权力格局多元化令亚洲难以有被广泛接受的地区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刚成立实力羸弱时，也从未被美国“领导”过。俄罗斯是独立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力量，苏联时期甚至曾和美国平起平坐。东盟自20世纪60年代成立后，一直试图在亚洲建立以其为中心的规则秩序。

第三，亚洲地区还存在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的大陆与台湾还未实现统一；中日存在钓鱼岛问题，俄日存在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问题，日韩存在独岛问题，中印存在阿克塞钦地区争议等主权纠纷。根据美国同盟体系安排，日本与韩国都属于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得保有陆海空三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没有交战权。在与韩国的同盟体系里，明确规定三军指挥权归于美国。1994年12月，韩国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更多是象征性意义，两国尽管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收回仍然遥遥无期。上述问题的存在一直在销蚀二战后建立的亚洲秩序合法性。

同时，亚洲秩序“碎片化”呈现两面性。一方面，联合国体系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反映国际公理与正义，特别是有关当代国际关系的理念和规则符合人类进步方向，中国也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体现在亚洲秩序上，尽管存在主权争议与历史问题等，但是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理念深入人心，一系列多边与双边规则也保证了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亚洲秩序“碎片化”根源在美国，“在秩序设计过程中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更多反映西方国家的价值和利益诉求”^①，随着亚洲国家实力的增长，必然要求秩序改革。

除了“碎片化”外，亚洲秩序变化调整还有以下原因：

^① 石斌：《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认知、政策取向与实现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

1. 美国破坏了亚洲秩序的积极面，扩大了消极面。“近年来，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内部生成了显著的冲击国际秩序的压力。”^①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美国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抗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急于“脱钩”“退群”。拜登政府上台后，组建一系列封闭和排他的小圈子破坏了地区秩序的开放与包容原则，AUKUS更是违反核不扩散承诺。美国还屡屡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不干涉内政原则。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案》《西藏旅行对等法案》《2019年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并经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拜登上台后，美国国会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法》，并经拜登签署成为法律。

2. 地区主要行为体对亚洲秩序的推动。日本近年来积极促进与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双边关系，日欧关系也进入“蜜月期”，并提出日本版的“印太战略”，旨在塑造地区秩序^②。“日本主流观点认识到，国际秩序变革势在必行，其关注的是转变的方式和方向。”^③对印度而言，在“印太战略”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抬升其国际地位，莫迪政府正在改变“不结盟”政策，转向功利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的“多面结盟”^④。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其目的在于面对北约东扩主动塑造欧洲地缘秩序，这对亚洲秩序也产生了显著冲击，比如美国的亚洲盟友更趋团结，美日加大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干预力度，朝鲜也固化了“拥核”立场等。

3. 中国积极推动亚洲秩序的改革与完善。从传统文化看，“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这种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和文化理念上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主张‘王道’，反对‘霸道’”^⑤。从外交实践看，中国始终保持很强的自主性，“中国固然没有积极谋求改变既有秩序，但在既有秩序及其规则可能或试图介入中国重视的关键领域时，后者往往表现出极为坚决、不容控制权旁落的主导姿态”^⑥。

在完善亚洲秩序上，中国的方向和目标有以下方面：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期，从地域上讲亚洲地区至关重要，中国需要通过秩序构建营造有利地缘环境。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

① 黄琪轩：《美国内部失衡如何撼动了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3期。

② 陈静静：《国际变局下日本关于国际秩序的战略认知及应对》，载《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5期。

③ 同上。

④ 李青燕：《印度融入美国“印太战略”新动向：驱动因素与局限性》，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5期。

⑤ 参见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⑥ 孙伊然：《亚投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①。第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希望为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包括制度和秩序在内的更多公共产品。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蒙古国时指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②。第三,身份政治与制度之争已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方面,面对美国以及地区相关大国关于亚洲秩序走向的讨论与推动,中国需要表明态度。2019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③。2013年10月,习近平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④。

综上所述,无论是秩序的“碎片化”,美国的破坏,还是地区其他主要行为体的积极推动,都表明当前亚洲秩序正处于深刻变化调整期。正如有学者评论:“旧的秩序破损、濒临坍塌,新的秩序将建未建,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事实吗?”^⑤

三、权力分享型亚洲秩序的构建

(一) 权力分享型亚洲秩序的构建基础

“亚太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取决于中美战略互动”^⑥,中美战略互动基础在于两国实力格局。有学者对当前和未来近20年的东亚权力格局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结果显示东亚已经浮现出中美两极格局,而且未来20年内仍将朝着这一格局继续演变”^⑦。有学者甚至认为中美正在全球层面形成两极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俄三极或多极世界是不现实的,并且以中美作为全球战略格局顶层国家,

①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10月26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026/c64094-23333683.html>

② 《习近平蒙古国演讲:家门口太平,我们才能安心》,载中国新闻网2014年8月22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8-22/6522134.shtml>

③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载中国人大网2021年9月18日,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9/14a689b1ea89463990901ad16cbf2d09.shtml>

④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载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

⑤ 袁鹏:《全球大变局与世界新秩序》,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0期。

⑥ 吴心伯:《论亚太大变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⑦ 韩召颖、黄钊龙:《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和东亚秩序:现状与未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9期。

以其他有影响力大国作为次级国家而形成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已经初现雏形”^①。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美国的70.1%，这也是二战后排名第二的经济体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的70%^②。在发展模式与制度安排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治理能力取得巨大成功，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力量差距。同时，中国经济已远超亚洲其他国家。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为例，中国经济总量是亚洲地区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近2.8倍，是该地区其他前四大经济体日本、印度、俄罗斯、韩国经济总和的1.27倍。中国在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进步均呈类似态势。由此可见，尽管在全球层面中国实力仍落后于美国，但考虑力量投放与距离的关系，在亚洲地区的实力格局上的确已形成了中美两极格局。“在亚洲两极格局已成现实的情况下，秩序变迁势在必行。”^③

中国已明确表明和美国合作的意愿。2022年2月，拜登政府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洲的发展。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对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至关重要”^④。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越来越担心被赶出亚洲，“美国最关心的战略性问题就是中国是否会最终取代美国的亚洲领导地位”^⑤。随着中国力量的提升，美国产生了“中国要替代美国”的战略判断^⑥。2018年9月，王毅外长表示，“中国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希望美国为维护亚太地区和稳定发展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⑦，这等于承认并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法利益，也对中美合作表示出了期待。实际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美国在亚洲地区已广泛存在，中国也没有能力将其赶出亚洲。

美国无疑会抗拒与中国分享亚洲秩序的领导权。但从现实看，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孤立主义倾向还是拜登政府提升盟友和伙伴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美国面对亚洲地区实力结构与秩序认同上出现对其不利态势的本能反应。除极少数国家外，美国也无力动员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围堵与打压，俄罗斯、巴基斯坦、老挝、

① 李冠群：《中美俄地缘战略互动及全球海洋秩序重建》，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5期。

② 1975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GDP）达美国的40.6%，1995年日本GDP达美国的69.6%。

③ 韩召颖、黄钊龙：《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和东亚秩序：现状与未来》。

④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⑤ Robert Sutter. Assessing China's Rise and US Leadership in Asia: Growing Maturity and Bal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0, Vol.19, no. 65.

⑥ 张蕴岭：《新时代的中美共处之道》，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2期。

⑦ 《王毅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演讲》（全文），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8年9月29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9/29/content_5326817.htm

缅甸、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朝鲜、蒙古国等国家明确反对美国对华打压，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试图构建的亚洲秩序不满。不管美国是否有主观意愿与中国分享亚洲秩序领导权，为维护国家利益，客观现实会继续推动其往这个方向发展。这个过程自然不会一帆风顺，还会经历激烈的竞争和讨价还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美国国内的战略家也注意到权力分享的必要性。美国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曾指出，“美国与亚洲战略对接的目的是要培育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为了增加中国成为全球主要伙伴的可能性，美国应该默许中国在亚洲大陆拥有突出的地缘政治地位”^①。

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言，“它们总体上希望中美保持某种均衡态势，从而为其在安全秩序的构建中提供更大空间”^②。顾炜在研究中指出，“在‘两强众弱’的地区结构中，两大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其他中小国家采取双追随政策，构建起一种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将最有利于地区的稳定与繁荣”^③。这也暗含如果权力分享型秩序得以实现，将符合亚洲其他国家的利益，应该能得到来自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

综上所述，亚洲秩序走向将是权力分享型。“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亚洲，没有一个霸主可以统领天下，以一国为老大，建立一个稳定的帝国秩序。”^④对此，笔者曾提出“中美双领导体制”是解决中美在亚洲秩序竞争的出路^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双领导体制”并非排斥该地区其他国家发挥作用，而是指中美两国应为亚洲秩序稳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二）权力分享型亚洲秩序的构建方向

有关亚洲秩序的未来走向，目前学界主要从文明角度进行分析。许纪霖认为，“去帝国化、去中心化和去等级化，乃是未来东亚共同体秩序的关键所在。一个欧盟式的东亚共同体，不仅是可欲的，而且具有历史与文化的可能性”^⑥。这和赵汀阳提出的新天下体系类似，即超越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① Michael D. Swaine. Beyond American Predomina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Need for a Stable U.S. - China Balance of Power.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4/20/beyond-american-predominance-in-western-pacific-need-for-stable-u.s.-china-balance-of-power-pub-59837>

② 陈东晓：《“秩序观”是亚洲安全架构建设的关键》，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4期。

③ 顾炜：《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

④ 许纪霖：《一种新东亚秩序的梦想：欧盟式的命运共同体》，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⑤ 参见王俊生《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2期。

⑥ 许纪霖：《一种新东亚秩序的梦想：欧盟式的命运共同体》。

倡导建立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①。薛力认为中国未来要推动的秩序是新时期的中华礼治秩序，亲疏有别，中国的秩序主要是靠双边关系，双边关系靠“礼”来区分远近亲疏，“礼”就是对中国的尊重，带有部分自愿等级制色彩^②。魏玲也认为，“国际秩序是文明过程塑造的”^③。

如前所述，权力与理念在构建秩序时缺一不可。如果仅考虑权力因素，“讨论未来国际秩序问题就转换成了大国经济长期增长问题”^④，由此所推出的最终结论必然是权力争夺与霸权争夺。如果仅基于文化角度，就会更多倾向于“中国特色”，忽略周边国家感受，有意无意地将国内秩序推演至国外，甚至会像美国那样，到处推广制度模式。中华民族复兴既是历史的重现，又是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走向21世纪世界舞台中央，在秩序构建上既有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必然也有21世纪国际关系的痕迹。同时，美国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亚洲秩序的主要领导者，中国在构建亚洲秩序时还必须考虑美国因素。概而言之，中国在推动权力分享型亚洲秩序时需处理好以下平衡：第一，美国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平衡。既能对冲和反制美国同盟体的负外部性因素，又能发挥美国积极因素以维护地区稳定。第二，中国特色与地区普适性的平衡。中国推动的秩序必须得到周边国家的接受。第三，历史与时代的平衡。历史上大国秩序构建主要靠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但当前要求必须是和平主义的。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与实力结构的平衡。综上，中国在权力分享型亚洲秩序构建中的具体行为方向如下：

1. 妥善处理美国因素。构建权力分享型秩序主要困难在美国。在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美国将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区域合作主张和方案视为“时移世易”的标志，本能地予以抗拒。从历史上看，中方从未有任何关于地区秩序的理念得到过美国的认同。郑永年认为，“过去都是西方领导世界，非西方世界从来没有领导过世界。西方世界并没有任何意愿接受中国的领导”^⑤。为此，一方面发挥战略定力，不管中美关系出现多少困难，推动合作的主旋律都不要变；另一方面要把握美国多元化特点，在推进高质量合作上下功夫。比如，利用教育、经贸、环保等议题，以及朝鲜半岛问题、气候变化、卫生健康等“第三方”议题

① 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② 薛力：《中国的新世界秩序与旧世界的关系》，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③ 魏玲：《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冲》，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④ 张宇燕：《国际秩序和中国外交》，载《世界知识》2014年第18期。

⑤ 郑永年：《国际秩序倒坍了》，载《联合早报》2020年6月2日。

加强合作，同时加强智库与地方等层面的合作。

2. 避免“中国中心论”和“地缘政治论”。所谓“中心论”有霸权体系色彩，暗含通过秩序构建建立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其余地区为依附于这个中心的边缘或亚边缘的等级体系”^①。所谓“地缘政治论”暗含新的亚洲秩序是中国地缘政治工具。良性地缘政治依托必然是双向的，它在改善中国地缘环境的同时，也必然会改善亚洲其他国家的地缘环境，而中国“地缘政治论”则仅强调中国依托周边国家的单向论，甚至暗含“中国阴谋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亚洲最大经济体，在推动秩序构建方面发挥较大作用，甚至有时发挥主导作用是客观事实。但如果没有周边国家的理解与支持，再美好的愿望也只是海市蜃楼，周边国家在亚洲秩序构建过程中掌握“否决权”。同时，亚洲中小国家最为担心的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双边关系再次回到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中国中心论”“地缘政治论”则正好印证了周边国家的这种担心。

3. 为消除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或者像美国和英国崛起过程中那样以邻为壑和战争不断，中国应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把自己“摆进去”，接受多边机制约束。“这种战略能够把中国在亚洲的威慑转化为威望，使得中国崛起的正外部性增至最大。”^②一方面，在地区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今天，地区合作，诸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非传统安全合作、防范与处置森林火灾和跨境救援等问题以及区域经贸合作等，越来越成为亚洲各国之间相互协调、解决问题的舞台。另一方面，通过几十年国家实力的发展以及外交手段逐渐娴熟，中国在地区多边合作中也逐渐变得“长袖善舞”，张弛有度。中共十八大以来，亚洲新成立的4个多边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亚洲文明对话均是由中国倡议推动成立的。这些多边机制尽管成立时间还不长，但已取得了巨大成功，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3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彰显出中国运筹区域合作与多边外交的能力已有大的提高。

4. 采取和平主义方式推动秩序变革。纵观近代、现代和当代世界秩序的变化重塑，基本上都是在大规模战争后由主要大国主导决定，并体现在体制机制、规

^① 汪晖：《“一带一路”走出历史终结论阴影》，载环球网2015年4月8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JJG59>

^② 张春满：《秩序失范、中美关系与东亚新秩序》，载《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4期。

则规范等方面的权力分配上^①。2022年2月，因不满美国与北约的地缘政治围堵，俄罗斯对乌克兰动用武力，试图用武力塑造地缘政治秩序。对中国而言，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探索，确立了和平发展道路，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确保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正确道路。2021年10月，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②为此要保持战略定力，看到和平与发展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期待，中国有智慧和和平解决与有关国家存在的问题。要加大与亚洲国家的利益融合，做大经济利益的蛋糕。同时，要多为亚洲地区提供公共产品。

5. 做好国内事情是关键。中美围绕亚洲秩序竞争的核心是两国在亚洲地区的认可度，说到底就是谁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拜登政府在提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口号时，特别强调美国只有搞好国内经济建设、提升经济与科技竞争力，才能更好地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③。历史上亚洲国家被中国所吸引，“不仅因为中国富有，而且是由于中国在文明上的领先”^④。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虽然进入不可逆阶段，但力量累积与质变是长期过程。面对当前已经形成几十年的亚洲秩序，中国想对其改革完善，难度也非常大。中国需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不断努力促进质变拐点的早日到来和确保拐点之后的持续发展”^⑤。需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次，“在26类产业中，中国与世界差距大和巨大的产业分别有10类和5类，占比57.7%。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和极高的产业分别有2类和8类，占比38.5%”^⑥，加大科技自立自强。需进一步补齐国内治理短板，特别是城市公共服务能力与基层干部的主动作为能力，降低社会风险。

四、结语

如果仅以权力结构为出发点，亚洲秩序构建离不开某种帝国规划，即试图以

① 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载《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5期。

②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共产党员网2021年10月9日，<https://www.12371.cn/2021/10/09/ARTI1633784656910440.shtml>

③ 韦宗友、张歆伟：《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2021年第4期。

④ 许纪霖：《一种新东亚秩序的梦想：欧盟式的命运共同体》。

⑤ 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

⑥ 《中国产业链安全评估：中国制造业产业链60%安全可控》，载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2019年10月21日，<http://www.cinic.org.cn/xw/cjxw/641727.html>

自我为中心,打败另一个竞争者,建立等级性支配性主宰秩序。事实上我们注意到,亚洲文化从来不认为“霸道”是建立体系的全部,甚至是核心因素,历来认为“王道”也至关重要。更何况,东亚制度分野进一步加大了权力结构分野,亚洲国家都追求和平与发展。因此,本文认为亚洲秩序构建应以权力分享为方向,这也意味着首先要维护秩序稳定,“中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不再是国际秩序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而是这个秩序的弱化和衰败”^①。

构建权力分享型秩序的最大障碍在美国。亚洲地区的热点问题频发恰恰是由于美国还没有和中国分享领导权,亚洲秩序安排没有反映出该地区的实力格局。中美两国如果能在亚洲构建起合作的秩序,两国就有希望在全球秩序构建上达成妥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更顺利实现。反之,如果中美两国在亚洲地区秩序构建上不能达成妥协,就很难实质性缓和两国战略对峙。由此可见,在亚洲地区建立分享型秩序也能服务于中美关系与全球秩序的稳定。

(责任编辑 胡巍葳)

^① 赵磊:《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Построение азиат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и роль Китая: принятие раз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ы

Ван Цзюньшэн

【Аннотация】 В начале своего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азиат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 признаки "фрагментации",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в Азии усилилась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между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и структурой власти,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еще больше подорвали позитивные факторы порядка, основны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гроки также прилагают все усилия для его радикального изменения, и азиат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роцессе глубок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раскладе сил Китая 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нтересах и желаниях двух стран, а также исходя из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региона, в Азии должен быть установлен порядок по модели раз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Целью Китая в продвижени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азиат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является создание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й для велик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ции. С этой целью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олжным образом соблюдать баланс между позитивными и негативными факторам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чтобы не только застраховаться 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негативным внешним факторам альянс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но и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их позитивные факторы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нять надлежащие меры по поддержанию следующих балансов: баланс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им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стью, нужно избегать "китаецентрализма"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олемики", укрепля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баланс между историей и эпохой, нужно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пацифистского подхода для содействия радикальному изменению порядка; структурный баланс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о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и силой, нужно надлежащим образом решать внутренние вопрос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азиатский порядок; роль Кит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яс и путь"; модель раз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Construction of Asian Order and China's Role: A Framework of Power Sharing

Wang Junsheng

Abstract: The Asian order has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agment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power structure in Asia has increased. The United States has further undermined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order and major powers within the region have also worked to reform it. Hence, the Asian order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adjustment, which is featured by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lined legitimacy of the order, and the deadlock of relevant regional hotspot issues. Considering the power, interest and wish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he interest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 power-sharing order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Asia. China's goal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ian order is to create a favorabl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limit and counteract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the US all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the US to maintain regional stability. Specifically, China should balance its particularity and regional universality, avoid "China-centric theory" and "geopolitical theory",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adopt a pacifist approach to promote the change of the order, and do a good job in domestic issues.

Keywords: Asian order; China's role; "Belt and Road"; power-sharing; China-US relations